

三湘從事錄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纖言

清陸圻

海東逸史

清海東逸老

三湘從事錄

明豪正發

神州光社

主
編
者

程 李 王
演 季 獨
生 季 清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

本書輯錄 李 季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神州國光社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

序言

我在本叢書第十七冊的序言中曾經說過，明末的內亂外禍，始則接踵而至，繼則並駕齊驅，尤演成空前的大觀，因此我於大體表現這種大觀的第十七冊外，復輯錄各種關於內亂的史料，作爲第二十冊，並草一長序闡發其內蘊，現在這一冊所收，大都都是敘述外禍的材料，計有下列三種：

一、陸圻的織言

二、翁洲老民的海東逸史

三、蒙正發的三湘從事錄

同時我也要用相當的篇幅指出這些材料應有的線索及其所包含的教訓，因爲外禍除一個朝代的興亡外，還有一個民族問題，比內亂更爲複雜而重要，我們對於牠應有充分的認識。

明末的人對於明朝的覆亡約具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爲起因於內亂，一種認爲起因於

外禍。如蒙正發卽主張前一說，所以他於歷舉流寇種種作惡，以致無從攘外的事實後，總括起來說道：

「北自燕都，南至滇粵，流毒所及，悉成潰決。故曰：『始終皆流賊之爲害也。』」（見三湘從事錄跋文）但在另一方面，夏允彝却主張後一說，他曾自問自答道：

「賊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於何年，皆以東彝發難也。」（見本叢書第十七冊五三頁幸存錄）

張煌言也持同一的意見，他在答郎廷佐的書中說：

「自遼事起而徵調始煩，而催科愈急；催科急，而民卒皆相率爲盜，是成寇禍者誰人也？」（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三五〇頁）

其實明朝的滅亡有許多根本原因，我在本叢書第十冊和二十冊的序言中已經說過，而因遼事所加徵的遼餉不過是其中較小的一種，絕不能視爲明亡的唯一原因。至於流寇只是那些原因所產生的結果；不過當外有強敵鷹瞵虎視之時，內亂愈烈，外禍便愈甚，這是完全自然的事，用不着多所說明的。

我們現在要追究的是滿族自努兒哈赤（清太祖）以夷酋而崛起建州，創八旗，立法

制始由簡單的部落進而完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在神宗萬曆末年，）在位十一年，一傳至皇太極（太宗），在位十七年，變成明代的勁敵；再傳至福臨（世祖），便君臨中國，何以這樣迅速？

根本原因自然是滿族因生活習慣的關係，精騎射，驍勇善戰，而將帥又得人，非漢族的武力所能匹敵，故能在短時期內橫行中國。當萬曆四十七年，楊鎬率四路大軍（號稱二十四萬，實不過九萬）進攻，努兒哈亦以傾國之師（六萬）迎戰，竟爲所敗，死亡過半。至崇禎十四年松山之役，皇太極復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指顧而定。這是雙方武力優劣的明徵，並非完全偶然的事。

當時明朝的人口約六千萬左右，滿族的人數雖不得而知，但總只有幾百分之一，大概不過如匈奴與漢朝人口數的比例。他們的武力雖強，人數却少，怎能征服全中國呢？並且『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他們即使能乘明之危，據有全中國，又怎能統治文化較高的漢族？此事的原因就在明末有的是頭等漢奸供他們的驅策，使他們在一方面得襲『金人……以中國攻中國』（引岳飛語，見宋史三六五卷五頁）的故智，佔據全中國，在另一方面，復進一步利用漢族的治術來籠絡漢人，使甘心受其宰制。我們現在可以提綱挈領地

舉出幾個這樣的漢奸來作爲例子。

在頭等漢奸中坐頭把交椅的當然是洪承疇。他本是明朝的薊遼總督，松山之役，兵敗被俘至盛京，絕食累日，以死自誓，崇禎帝也以爲他已死難，予祭壇十六，至爲傷痛，可是統治階級的生存所造成的享樂主義終於決定了他的前程，皇太極的絕色妃子博爾濟吉特氏的婢裝入侍，軟語柔情打動了他的心弦，她手中的人參湯振作了他的享樂意識，他於是背叛國家與民族，投降他所征討的外敵了！

皇太極忽然獲得這樣一個賣國求榮的大人才，真是喜不自勝，親到洪承疇的室中，演一套解衣推食的把戲，將自己的貂裘脫下給贈洪氏，後來更是賞賚無算，並陳百戲作賀。這在洪氏固然覺得皇恩浩蕩，富貴重來，但滿族的糾糾武夫却不心服，以爲洪某不過一羈囚，不應受如此寵待。皇太極便向他們解釋道：

『「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欲何爲？」衆曰：「欲得中原耳。」皇太極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二〇〇頁）

這個『引路者』的確可算是清朝第一個開國功臣，因爲他不獨於清兵南下後，始則招撫江南，繼則經略湖廣，雲貴，兩廣，終則奏請三路大舉攻明，盡了他的最大的力量，而清朝

的開國規模也爲他一手所規定。他承着主子的意志，希望滿族永遠做中國的統治者，規定滿人只許爲官爲兵，不得爲工商，藉免削弱他們的統治力量。這種政策原至狠毒，近人筆記竟認『此則洪承疇之有功於漢族，抑若善於補過者』，因爲一則漢人的農工商業在二百七十年中得免其擾，二則旗人『仰恃漢人，猶嬰兒之於乳母，民軍一起，數月而亡』。蕭一山竟稱『其言不爲無見』（見同書同卷二六六頁），這未免太滑稽了！洪承疇背叛民族利益，使漢人出租稅供養持刀相向的整個滿族，爲古今中外的史乘上所僅見，這也談得到『有功』與『補過』上去，則一切漢奸不利於漢族的一切舉動，無不如此！至於嬰兒乳母的比喻簡直是最無恥的自寬自解之詞，因爲漢族明明做了二百七十年的家奴，猶自詡爲『乳母』，滿族明明做了二百七十的統治者，竟視爲嬰兒！像這樣的嬰兒，正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國家所願意做的，大好的中華民族準備哺乳罷！

在漢奸中坐第二把交椅的是吳三桂。他原爲明朝的遼東總兵，襲平西伯，當李自成入據北京，令其父招降，他在歸途中本擬從命。及聞自己聲色俱絕的愛妾陳圓圓爲自成所據，便大怒，遽易縞素，爲先帝復仇。吳偉業的圓圓曲所謂『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正是描寫這種情形。

吳三桂既不肯降賊，即疾歸山海關，上書清攝政王多爾袞請兵，許「裂土以酬」。然多爾袞覆書，已經表明趁火打劫的態度，明告三桂，「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三桂此舉，明明是前門拒狼，後門進虎！但他爲要保全他的身家，延長他的富貴與享樂，也就顧不得這些，於是輕輕地引虎入室了！

他首先向他的「率衆四十萬」，前來山海關迎戰的情敵進攻，輔以清兵，獲得絕大的勝利。旋奉新朝命令，與滿族諸將窮追自成至西安，擊敗他的六十萬衆，平定陝川，終於與洪承疇奏請乘機大舉，追永曆帝於緬甸，執歸雲南，絞殺於市，並及其十二歲的太子。

此外，從清兵入關的大漢奸還有耿仲明，尚可喜，和孔有德。他們都是降清的明將，因平定南部中國有功，一鎮福建，爲靖南王，一鎮廣州，爲平南王，一鎮廣西，爲定南王，與鎮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稱「清初四藩」，都是屠殺漢族的僧子手。

然講到屠殺，我們總不該忘記李成棟，雖則他的職位遠不及上述數人。他也是以明將降清的，從清兵入關後，屠嘉定，屠廣州，最爲努力。

至於清兵入關後，明將爲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祿而投降的，多至不可勝數，而劉良佐，金聲桓，鄭芝龍，孫可望等算是其中最著名的。

我們應當知道，明末如果沒有這許多降將幫助清兵打江山，他們即來趁火打劫，也決不能據有全部中國，至多不過像金之於南宋一樣。隔江對峙，因為他們的兵力有限，絕對不敷分配，舉個例來說：『清軍之陷金陵，下淮安也，不過數萬之兵』（見清代通史上卷二，九六頁），而江寧『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有奇皆降』（見本叢書第十八冊四三頁，韓荃江陰城守紀）。當時的明將如果不以投降為唯一的出路，而決心抗戰，清軍未必有戰勝的把握，即能以少勝多，也未必能完全消滅這種抵抗的軍事勢力。他們如果要因此節節設防，當然無此力量。況且北部和西部中國的軍隊如果也同樣起而抵抗，他們根本就不能東下，否則也是孤軍深入，自陷絕境的。現在不要講到處抵抗，會使清兵無所措手足，即就江陰而論，在四週都已降清的當兒，嬰城固守八十餘日，在全部軍事上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可言，其實不然。因為此舉。

『蔽遮錢塘南下之師，捍衛閩廣新造之國。』（見本叢書第十八冊一〇〇頁沈濤的江上遺聞）

7
非常重要。由此可見不戰而降的將士們背叛明朝，出賣民族利益，是何等罪大惡極！由此也可以看出豫王多鐸，英王阿濟多，肅親王豪格等能夠以少數清兵橫行中國，全因得力於漢

奸的輔助，否則很少成功的希望。

自有了這種漢奸，即無清兵，他們也是會替新主人開闢江山，因而爲自己圖謀利益的。例如金聲桓就是如此：

『未費滿洲一矢斗糧，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見同書同冊一〇五頁徐世溥的江變紀略）

這樣一來，要想這個『新朝』不做漢族的統治者，在勢是不可能的了。

然投降清廷，出賣民族利益的，不止於這些漢奸，不止於武官，即文官也是一樣，總說一句，是完全不分文武的，試看：

『清軍抵北京，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見清代通史上卷二六一頁）

而史可法的部將張天祿於投降清軍，供其驅策後，自己已屬無恥，甚至於還在嘆息：

『渡江以來，所過州縣，不少名進士，皆苟活無恥。』（見同書同卷二九九頁）

至於南京的情形更是不堪：當豫王抵京，明的降臣除依照亡國公式，出迎五里外，

『文武各官爭趨朝賀，職名紅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數處。』（見本叢書第十八冊三二

三頁，江南聞見錄）

以上猶可諉之於南京無主，勢所必至。然隆武帝所在的地方也不見得好些，試聽他對臣下說罷：

『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多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著錦衣衛檢明封數，對衆焚之。』（見清代通史上卷三一〇頁）

這些事實證明所謂投降，不是單個人的行動，而是大羣人的行動，換句話來說，是一個階級的行動。所以降清的進士李紹祖於被執受瞿式耜的詰責時，答道：

『天下人皆降，豈獨紹祖也？』（見三餘氏南明野史下卷二九頁商務出版）

而何騰蛟被執，於烏金王勸降時，也說：

『王何患無降官降將哉？』（見同書同卷三一頁）

現在要問這是那一個階級？當然是統治階級，即自由地主階級。此事十分顯明，不用多說，因為當時的文武官吏，尤其是較大的，都是地主，而上述那些文武官的行動正代表這個地主階級的趨向。如果要求事實的格外顯明，也不妨舉出一個例子來，即鄭芝龍的投降：

『芝龍田園徧閩廣，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餘所，驚馬戀棧，遂進降表。』（見隆武遺

像這樣的投降自然不限於爲官吏的地主，就是鄉間的地主也沒有兩樣。如『家富耦國』的謝三賓係以鄉紳而降清，並甘心作漢奸，向清軍告密的（見海東逸史第七、第九和第十四卷），鄉間的團練是在這種鄉紳的手中，因而變成清兵的先鋒隊，雖窮鄉僻壤，也無孔不入。如王翊結寨於四明山，即被這種團練勾引清兵攻破，所以他對諸將說：

『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嚮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見海東逸史第九卷）

這可見地主階級的投降是普遍的。所以王毓蓀很沉痛地說：

『冠裳世祿之家，營窟以待新朝；郡邑蒞事之長，收圖以修降表。迫呼犒迎之費，盡屬青衿；供奉大清之牌，遍傳黔首。』（見本叢書第十一冊一六〇頁，徐芳烈浙東紀略）

然這個地主階級爲什麼要投降清廷？根本原因是：明代因經濟上的大變動（參看本叢書第十冊的序言）和政治的日趨黑暗，使種種矛盾日形尖銳，而流寇一起，地主階級的政權根本發生搖動，並急劇地日趨崩潰。到了這個時候，牠已沒有統治的能力，也更沒有自信的把握，而新興的滿族又挾着強健的兵力以爭中原，牠看見（內中有些分子是預覺）來勢太兇，不可抵禦，其中的右派以至衰老派便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實行投降，藉以保持本

階級的利益，地主們的生存決定了他們的思想與行動，他們在自身衰敗和強敵壓境之際，必然要走上投降的道路，沒有法子可以避免。試看南宋末，首先向元朝投降的，不是地主階級麼？試看一八七〇年的法國首先對德國屈服的，不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麼？這是中外歷史上的通例，我們對於明末的地主階級也並不怎樣嚴加責備。

根據上述的事實，便知道明代的亡國是出自地主階級的請求，牠在當時緊迫的情勢之下，真是甘心情願亡於異族。關於這一點，我們却不能不特別責備牠。因為吳三桂的引虎入室不是出於他個人的意志，而是代表最大部份的地主階級的意志（即使三桂不去請，也自有人擔任這種工作的。）這個階級以爲明代的江山與其落入流寇之手，毋寧贈給滿族，這和清末的皇室宣言不予家奴，寧贈外人，是同一心理。所以夏允彝告訴我們說：

『一時投降恐後者，以寇爲先帝之仇，□能爲我滅賊，非我仇也。』（見本叢書第十七冊五三頁，幸存錄）

其實這只是『投降恐後』的地主們掩飾自己出賣民族利益的一種無聊的門面話，因為滿族和中國對抗已經幾十年，漢族因失地喪師的結果，早已視爲寇仇，忽然來一句『非我仇也』，豈非『欲蓋彌彰』？不過拿外寇與『家奴』（流寇）對比，寧歡迎外寇做

統治者，而不願『家奴』做統治者，這的確是行將滅亡的統治階級的心理。就這一點來看，『非我仇也』也是一句不打自招的老實話。所以引清兵入關，是完全代表這個階級的意志的。

現在總括起來說：清軍的入關是漢族的地主階級請來的，清廷的迅速建立牠的統治權，也是漢族的地主階級竭力助成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清軍雖也會自動入關，但決沒有力量統治全部中國；即使能勉強達到目的，也決沒有那樣容易，那樣迅速，並且也決不能持久。這完全是平心之論，絲毫沒有深文周內的地方，試看清廷對付明朝那種巧妙的政治手腕，那種不獨盜有其國，『並與其森知之法而盜之』的手腕，決非文化低下和習俗不同的滿族所能夢想得到，完全是這個階級的頭等漢奸教成的。今特分述一二於下。

在李自成陷北京之前，清室原無向中原問鼎之心，至少是不敢宣揚出來，但崇禎縊死後，經漢奸們的唆聳，態度突然一變，所以多爾袞在報吳三桂的書中說：

『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明國君臣……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略，蓋示意於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見清代通史上卷二五九頁）

迨多爾袞到京，知道地主階級請求入關的心理，便宣佈取消遼餉，剿練，練餉等一切賦額外的加派以資報酬，順治帝入北京，復申此議，並做一些『嘉惠臣民』的事，藉以收拾人心。他們知道漢族素重禮教，遂裝出『貓哭老鼠』的假慈悲，替崇禎帝后發喪。試問這種『惠而不費』的舉動即使出自真誠，又值得什麼？但一傳至南京，又變成投降諸大臣冠冕堂皇的遮身牌，大書曉諭於通衢，并刊刻宣播遠近說：

『自遼金元以來，由朔漠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代無道，廢不棄好而構隙，問罪以稱兵，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奮義，逐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恥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肅清宮闕，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見織言下卷）

像這一類的話完全是喪失民族意識的最無恥的話，因為牠承認蹂躪中國的遼金元的強有力者爲『有道』，藉以襯出清朝更是『有道』中的『有道』！牠把外寇與流寇爭江山看做『討賊』，『救援』，把掩埋一個皇帝皇后看做仁至義盡的曠典！不過在禮教的虎頭牌之下，這也是名正言順的！然能給予南京的漢奸以這樣好口實的，決不是不懂禮教的粗鹵的滿族，而是在北京發縱指使的漢奸，這一點還用得着懷疑麼？

其次，當清室定鼎北京之時，弘光帝也已正位南京，清軍一方面要鎮壓北方，另一方面又已移師西討，自然還沒有力量來對付南方，於是又假仁假義地說：

『其不忘明室，輔立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見清代通史上

卷二六七頁）

這明明是表示：我們已據有你們的北方，你們請便，就偏安江左罷。可是口血未乾，他們又得寸進尺，要奪取南方，多爾袞在致史可法的書中說：

『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收漁人之利』（見南開野史上卷二四頁）

強暴的外寇趁火打劫，既已奪去北方，被搶劫的國家退保江南，他們却斥爲『坐收漁人之利』！這正是我們幾千年來『侯之門仁義存』的大道理，也就是翻雲覆雨的漢奸們筆底下替他們寫出來的『王道』！

像這樣的『王道』一來，我們漢族中的大部份便變成魚肉了。試看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廣州之屠，以至數不清的……之屠，不斷地出現，就是發揮漢奸們喊出的『王道』的裏面。我們應當知道，所謂『王道』是有表面和裏面的：表面是漢奸們所做的工作，